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斗争(一)

1942年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较为困难的一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日日面对日寇、汉奸这样看得见的敌人，也常常面对天灾等看不见的敌人。疫病，就是这样一个个看不见的敌人。

陕甘宁边区，地处历史上的瘟疫流行区，由于闭塞和落后，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条件差，传染病的暴发年年都会造成人员的病亡。延安1941年在春季流行的麻疹、百日咳、夏秋季流行的伤寒，使数百名干部及家属患病，十多人死亡，即使治愈，也已给边区经济及工作带来损失。况且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多以集体生活方式为主，一旦疫病发生，后果极为严重。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周边频传鼠疫消息，日寇在中国部分地区施放鼠疫等的生物战也已开始，边区防疫形势一时空前严峻。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保护人民群众和干部战士的健康，从防疫工作来增加抗战的力量，边区党政军机关积极部署开展1942年的边区防疫工作。

防疫工作。

1942年春，与陕甘宁边区相连的晋西北静乐一带有天花、伤寒、鼠疫等疫病出现并蔓延，死者甚众。宁夏、内蒙古一带据说也出现了鼠疫疫情，同时有事实证明日寇在冀中“扫荡”的过程中在部分地区施放携带鼠疫杆菌的疫鼠、跳蚤。4月初延安卫生当局奉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训令，颁发防疫工作指示，其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对鼠疫的预防。此时延安城中又传出绥德警备区已受鼠疫蔓延的谣言。

为应对可能暴发的鼠疫，并进一步调查鼠疫发生的真相，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4月28日边区政府拨经费30万元，成立边区防疫总委员会，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傅连璋、李志中、李治、饶正锡等为委员。总会设于中央医院，计分防疫统计股、宣传教育股、环境卫生股、总务股、医疗股等五股。总委会之下，设立分委会四处，各自负责所划定区域的防疫工作，延安之外各县

的防疫工作由所在地军政医疗机构负责进行。5月下旬延安市委又划分四个分区进行防疫，各分区防疫委员会在各机关学校人口较集中地区设立支会，并规定每月将工作总结汇报总会，如遇有传染病发生时，应及时报告，并确定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及各乡政府在各分区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责任。在防疫总会一个多月工作的基础上，6月2日边区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仍以刘景范为主任，该会任务为筹划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直接领导延安周围40华里的防疫工作。

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防疫委员会(总委会)的积极领导下，全边区特别是延安市的防疫工作积极开展起来。4月至6月初防疫的中心任务是预防鼠疫。围绕这个任务展开了许多具体工作：防鼠疫宣传；开展邻疫区的县政府、专署及时报告当地疫情；会同防空司令部，拟定严防敌机撒放鼠疫杆菌的办法；拨捕鼠奖金鼓励群众捕鼠，同时设法购置鼠疫血

清及疫苗备用。所幸临区鼠疫并未传入边区，6月防疫委员会根据上一年传染病流行情况将防鼠疫的中心任务改为预防肠传染病，中旬颁布了预防伤寒赤痢指示信，各分区分别围绕新的中心任务开展大规模的清洁环境、培养卫生习惯、卫生检查等工作。

为了推动各级机关对防疫工作的重视，防疫委员会呈请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核准延安市委党政军各机关，严格执行防疫委员会的预防伤寒、赤痢的指示，并拟将执行程度作为各机关行政考绩之一，以后遇有发现伤寒病人最多之机关，该机关之行政负责人及党的支部均应负推行不力，保证不周之责任。

在边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防疫工作，这还是第一次。严密的组织、统一的领导，是边区开展防疫工作的必要条件。防疫工作在边区防疫工作的领导、检查、协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移民岁月 第九十三期

一位北京人的支宁经历(三)

张乃铮 口述

三、参加西北干部大队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派北京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800多名毕业学员组成西北干部大队到大西北参加革命和建设，当时由西北局组织部何载同志负责领导。出发前又集中在一起，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

1949年8月10日，大家在北京西站集中，一列有35节车皮的列车拉着张乃铮他们正式出发。天特别热，上了京浦路到天津，接上草大天津分校的学员，为每人借了军用水壶，到西安后就交给了西北野战军。到山东德州，张乃铮才知道山东的扒鸡好吃。又沿着德石路往石家庄走，接上正大分校的学员沿正太路到了山西榆次，做了简短的休整，三个大队分开行军，张乃铮被编在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80多个人，全是回民，为行军吃饭方便，把回民编成一个分队。

坐着小火车到灵石县后就没火车坐了，改成徒步行军，沿着在战争中被拆毁的同蒲铁路走了800里。从沿途山坡写的标语可以看出，张乃铮他们步解解放军18、19两兵团的后尘前进，学习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规定，每天帮助老乡挑水、锄地、出门板报，经受了一次解放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到风陵渡，过了黄河，沿陇海路到潼关，坐火车于9月5日晚终于到达终点站西安。晚上吃饭时，在当地的正大豫饭庄发生了一件因事先沟通不周而造成的不愉快事件。晚上在西北大旅社安顿住宿，放好行李去正大豫饭庄吃饭。大家坐好正要吃饭时，学员冶正刚(曾在北平进修，是一名新式阿訇)说这里的饭不能吃。他们是来西北做回民工作的，西安有200多家回民馆子，安排在汉民饭馆吃饭，他们今后怎么工作呢？大家一听说得有道理，就僵持下去了。曾在北平参加地下党的李淑贤说，要么大家忍一忍，回旅馆睡觉，明早上再吃。当时大家又饿又困，回到旅馆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在正大

街吃羊肉泡馍时又闹了个笑话：大家见干粮饼子上市了，拿起就吃。跑堂的见状上前说，不是这么吃，先要掰开馍泡到碗里，浇上肉汤吃。

四、参加回族干部培训班

这期间，其他同志大部分分配了工作，赴各地去了。回民学员都没分配，被抽调到西安市各中学做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庆祝活动。“十一”后，根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指示，由西北局城工部(统战部)办一期回民干部培训班，地点在建国路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西北局城工部民族科科长宗群任班主任为学员讲了马列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和西北各民族族情的情况，主要是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的情况。此外，还旁听了西北局机关党总支改选西北局机关、欢送贺龙同志进军西南的大会等。张乃铮体会到党组织极其热心、极其认真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学习了两个多月，于12月30日毕业。1950年元旦后全班80多个人，除留西北工委、军政委员会、西安市民委的10余人外，其余都分配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

在学习培训时，习仲勋2次来班里，开学和毕业时都讲了话。分配时，习仲勋得知一些学员要求去新疆，他说，新疆那么大的地方，你们这些年轻干部没经验，不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就到陕甘宁工作吧。分到这几个省区的，也不要直接去工作，先实习一段时间再去。分配到各省的都走了，分到宁夏的一组8人，张乃铮是组长，史国祥(河南人)是副组长，组员有信雅琴、杨静萍、马有铭、王正邦、连志谦、闪文书，在他们之前，还有十九兵团来西安的几个人，也分配到了宁夏，有冶正刚、张文月、刘竹泉等5人，正好是在正大豫饭庄坚持不吃饭的那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回族学员，这几个人未参加回干班3个月的培训就早早抽调到宁夏了，冶正刚分到金积县文教科，张文月分配到罗县，刘竹泉分配到惠农县，他们几个坐汽车到银川。(撰稿 蒋学英)

银川市成为宁夏首府的过程及历史意义(三)

3. 工业格局得到改善

银川市经济建设从工业开始起步，借助自治区成立成为宁夏首府城市的机遇，在原有薄弱的工业发展基础上，借助“三线建设”国家大中型企业和自治区27家工业企业在银川落户的机遇，利用本地煤炭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本地煤炭、电力、农副产品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逐步建立起一批以食品、皮革农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企业，利用本地煤炭、电力、农副产品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逐步建立起一批以食品、皮革、农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三线”建设项目在银川的实施，一批工业企业，尤其是化学工业、机械制造等企业建成投产后，银川市的工业布局得到了很大改善，工业门类增多，规模扩大。在“三线建设”迁建企业的带动下，银川标准件厂、银川机床修配厂、银川电线厂等一批中小型配套企业也先后建成投产，增强了工业企业相互协作的能力。同时，自治区根据中央支持地方兴建企业的有关政策，凭借包兰铁路通车的历史机遇，在银川兴建棉纺厂、氮肥厂、毛纺织厂、电表厂、机床维修厂等不同产业门类的工业企业，加上银川市建成的市属5家工业企业，以及街道、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兴办的集体企业，全市工业实力增强，开始了现代化工业发展。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6272万元。

4.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初步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筹

备成立之初，整个宁夏没有一所严格意义上的高等学府。1958年7月16日，中共宁夏工委下发了《关于成立宁夏大学筹委会》((1958)277号文件，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对宁夏大学筹建工作的领导，拟定成立宁夏大学筹委会。”8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向中共宁夏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提出意见：“宁夏大学未建前，为了适应宁夏工农业‘大跃进’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今年在银川师范、卫校、农业机械化学完成各校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增设宁夏师范、医学、农学三所院校。”从1958年起，宁夏在银川开始筹建综合性大学一所，宁夏大学未建前，为了适应宁夏工农业建设和宁夏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先开设农学、医学和师范三所学院，招生400名。不久，银川师范学校和银川农校、银川卫校合成了宁夏师范学院，在银川农业机械化学的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农学院。9月15日，坐落在银川市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等3所高等院校建成招生，并联合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结束了宁夏没有正规高等院校的历史。高等教育开始起步。这一年，银川扩建和新建了各类学校310所，成人教育也开始起步，成立了银川夜大学，城乡涌现出许多政治、文化、技术三合一的各种业余学校。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事业出现盲目发展的情况，但在随后的整顿过程中，很快恢复和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采取多种形式、两条腿走路

的办法，创办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半工(半农)半读学校，并巩固和发展了中小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1965年，全市各类学校发展到390所，在校学生74637名，专任教师3057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4.8%，城乡居民文盲、半文盲人口下降到65%。

为了支援和发展宁夏的文化艺术事业，自治区成立前夕，在中央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在首府银川市，由中国京剧院四团划归宁夏组建宁夏京剧团，上海华艺、光影、红花越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建宁夏越剧团，并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全国总工会工人艺术团和话剧团、中国杂技团等艺术团体部分演员来宁支持下，分别组建宁夏歌舞团、宁夏话剧团、银川杂技团，使专业文艺表演团队从无到有，初步活跃繁荣了群众文化事业。自治区成立后，中央及各省市对宁夏的文化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自治区的文艺团体和文化管理机构均在银川，加速了银川市文化事业的发展，自治区和银川市专业艺术团体大量增加达到8个，演职人员约600名；自治区图书馆和科技图书馆相继建立，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建的市图书馆、三个图书馆共藏书18万册；另外还成立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同时，在自治区的帮助下，银川市的文化力量加强，专业文艺创作队伍逐步形成，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也比较活跃。市文化馆组织业余文艺演出队创作剧目并经常下乡演出。

文化事业日趋繁荣。体育方面，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新建了一座容纳2500名观众的银川体育馆，自治区体育场也建成落户银川，新增大的24所大、中等院校和一批新建或内迁的厂矿企业都有自己的体育场地和设施，为群众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体育竞技水平在西北地区居于上游，银川市大批优秀运动员入选自治区建立的各项专业队，银川市运动员马成东于1959年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国际田径比赛。群众体育也得到较大普及，1959年银川市第一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参加比赛的农民运动员252名；到1963年，全市各系统组建的各类球类运动队达到149个。

自治区成立后，银川市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1957年成立市人民医院，1958年成立银川市中医院，随后又成立了银川市城区医院、新城区医院(1963年扩大后改为银川市工人医院)，几个联合诊所下放到城郊公社成立公社卫生院，部分大队成立卫生所。1959年成立的自治区结核病防治所也于1963年划归银川市，1964年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并入市医院。同时城郊几个公社成立公社卫生院(部分大队成立卫生所)，一些较大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也都设立了医务室、卫生所。1958年以来的几年时间内，银川市城郊以医院为中心的三级医疗网基本形成。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发展到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



宁夏革命文物蕴含的感人故事(下)

毛泽东革命精神的承载者——一个铜手炉

宁夏博物馆藏有一件铜手炉，是毛泽东夫妇在宁夏盐池县工作时使用过的，由原回汉支队政委梁大均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后捐赠入藏博物馆的。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解放了宁夏盐池，刚解放的盐池，百废待兴，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急需帮助和指导。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带领工矿科科长高登榜、会计科长钱希均(毛泽东夫人)等人，赶到了刚解放的盐池恢复经济工作。一连几个月，他每天骑着马到各区、乡考察指导，不能按时吃饭，看到这种情况，盐池县委的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只铜手炉，不仅可以暖手，还可以随时加热干粮喝到热水。毛泽东夫妇在盐池工作近半年，帮助盐池县建立消费合作社，大力组织当地土特产品运向外地换回军民急需物品，为缓解盐池的经济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36年12月，毛泽东、钱希均夫妇离开盐池时，将铜手炉还给了盐池县委。

这件铜手炉，承载着毛泽东夫妇组织盐池县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伟大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品质，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



▲铜手炉。



►马文良烈士使用过的油灯。

他们团结发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使盐池经济很快得到了良好发展，一举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的建设。

印章上自治政权的故事——一枚印章

宁夏博物馆藏“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直径10.5厘米，木质圆形印面，外圈用中阿两种文字刻划。这枚看似普通的印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的大印。

1936年10月20日，中共陕甘宁省省委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

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并通过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处理债权债务暂行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及自治政府的组成人员，雇农出身的回民马福当选为主席。

1937年2月，自治政府主席马福因敌人告密被反动民团逮捕，在敌人的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1937年4月英勇就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活动终止。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存在了短短的6个月时间，但却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后来

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历史借鉴。

凝结着革命先烈的事迹——一盏油灯

宁夏博物馆藏有一盏马文良烈士使用过的油灯，它凝结着马文良在宁夏盐池开展革命工作的一段艰苦卓绝的光辉斗争历史，记录了先烈马文良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马文良，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海城镇人。1937年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组织发起“延安回民救国会”，10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任马文良为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派员兼团长，派往定边、盐池边区开展工作。1941年2月，马文良来到盐池县的回六庄村开展革命工作。马文良到达回六庄后，白天进庄入户进行视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晚上点燃油灯教老识字，为了节省灯油，每次他都只点一根灯芯，这样灯油就能多用两天。马文良的到来，被暗中观察的特务知晓，引起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的恐慌。2月20日，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出驻扎在海子井的特务连包围了强记滩。马文良等不幸被捕。1941年4月17日深夜，马文良、崔景岳、孟长有三人一同被国民党宁夏当局活埋于银川城隍庙，马文良年仅29岁。(据《中国文物报》)



上世纪70年代刘世俊与家人合影(右1刘世俊 中间两个孩子 左1妻子郭雪六)

刘世俊：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那天欢庆胜利的场面至今我也难忘。后来我还写下了两首诗，记忆当时的场景。

诗一：
杆头扯下膏药帜，
当街扬灰任风吹。
草从竟得敌军帽，
草友争充小使池。
诗二：
喧天锣鼓送瘟神，
力击铜盆伴四邻，
底漏形残心志忍，
爹娘却把额头亲。
抗战胜利后，刘世俊一家团聚了，他考上天津南开中学，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

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学校很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体育健身。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刘世俊经历了天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抗美援朝，同学中有人写书信报名参加志愿军，这些都给他心灵里的爱国主义思想“添柴加火”。随着年龄的增长，觉悟中更多了自觉和理性，植人脑海里的中华文明激发的良知变成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深刻的认识，强烈的爱国心变成了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和行动。

刘世俊：上中学时我就认识到，要爱国爱党，首先要继承一切传统的文化和美德，所以我特别喜欢学语文，当然别的课成绩也不错。老师讲《出师表》，我不看书就能背，因为我真的在追随着中华璀璨文化中

扎根宁夏六十载 桃李满园不负韶华

——记移民教师刘世俊(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成长起来的青年，我跟老师说：我考大学要考师范，要当语文老师。高中毕业时很坚定地报考了师范中文系。在当亡国奴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盏明灯在照耀着，要传承中华文化，要做好一个中国人。

张伯苓老先生1951年在天津逝世，当时周总理也在天津，还专门到了南开中学，那天大家正在操场踢球，突然校长说：大家都快到礼堂去，周总理要给我们讲话，那是刘世俊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特别亲切又很激动，总理讲话不长，核心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珍惜美好时光，长大后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这对刘世俊也是一次特别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后来能够立志放弃大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西部建设，都与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南开中学还有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文艺和体育，学校把这些看成教育的一个部分，南开中学受的教育也奠定了刘世俊以后事业的方向和治学的方向，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南开中学6年的学习可以说是受用终身，包括他来宁夏大学，还经常能想起上中学时学到的很多知识，特别是南开中学为他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

1954年，刘世俊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在大学期间，刘世俊最感激也很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国内优秀的学者和老师，启功先生给他们讲过唐诗、陆宗达先生给他们讲过古代汉语、刘盼遂先生给学生讲过先秦文学，这些顶级国学大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渊博的知识，更用他们厚重的品格影响并成就了同学们做人的选择。应了那句名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刘世俊遇到了他的终身伴侣郭雪六，是他同班同学，高贵的气质、漂亮的身影和温柔中带有果敢的性格都成为吸引他的磁场，毕业时二人一同报名来到宁夏。(商银生 整理)